

论人、我、自然的和谐发展:疫情的社会心理学反思

孙时进 齐 巍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预防和控制不仅是一个科学技术的问题,还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议题。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生、蔓延是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己的关系失调的体现。他人、自我、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培育好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亲善友爱良好社会心态,把握好物质与精神、自由与规范、统筹与协作平衡发展的社会治理方法,可以在疫情的预防和控制中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疫情;社会心理学;和谐发展;社会心态;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0)02-0099-06

1 引言

2019年12月初,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自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并向外蔓延,截至2020年3月25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发布累积确诊病例超过8万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目前中国境内的疫情在各方的协作和努力下,初步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然而世界疫情形势却不容乐观,世界卫生组织声明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控制的大流行病,目前其他国家和地区总的感染人数、死亡人数均已超过中国境内(世界卫生组织,2020)。从国际国内的疫情防控中出现的问题看,此次疫情并非仅仅是医学科学和技术的问题,同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反思。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四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存环境发生了质的飞跃,虽然急速发展带来了物质富足、相对安全和普遍地位的提升,但是经济和科技发展“快”到了“心灵”跟不上的地步。滞后的心灵成长将会阻碍社会健康和谐地发展。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关系的失调,不但带来了社会戾气、社会矛盾,甚至也成了灾害和疫情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构建人、我、自然的“天人和諧”关系,不但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防疫、抗疫的重要因素。具体到社会心理学上,如何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实现人的现代化,进而强化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平衡充分发展,是社会心理研究者重要的时代使命。

2 疫情:人、我、自然关系的失调

从疫情发生的缘由、疫情蔓延的推动力来看,都与人类有关。这次疫情产生极可能与人类滥食滥杀野生动物有关,其实也就是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失

范有关。而人类自身的紧张、恐惧、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与许多“互害”行为又是疫情不断蔓延以至成为世界性大流行病的重要推手。有句话说“人正确了,世界就正确了”,从心理学的视角看疫情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成了人的问题。

2.1 疫情发生: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

在人类300多万年的生存发展史上,人类在战胜自然方面取得的巨大胜利,让人从人类初期对自然的畏惧崇拜发展到了忘乎所以的自大傲慢和自我中心。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了人类掌控自然的力量,也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善。这也让许多人产生错觉,变得愈加贪婪,开始向大自然无节制的索取,为了个人需求和物质享受,造成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的破坏。

此次疫情同样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其爆发蔓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2003年底,中国广东省出现一种新的临床重症疾病,即非典型肺炎(SARS冠状病毒,SARS-CoV)。SARS在人群中快速传播,迅速蔓延至中国其他省份及其他28个国家(Chinese SARS Molecular Epidemiology Consortium, 2004)。病毒直接源头是售卖、食用果子狸,根据人类与果子狸的病毒进化与菌种比对,最终确认了SARS真正的自然宿主中华菊头蝠,由于蝙蝠群落中存在基因池丰富的SL-CoVs(SARS样冠状病毒,SARS-like CoV),科学界普遍认为,由蝙蝠传播的冠状病毒很可能重新出现,导致下一次疾病爆发,而中国可能是下一个爆发地(韩鹏宇,2020)。然而,科学家的警告并未起效。17年后,极有可能由于进食野味的原因,中国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发了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

从微观心理学分析,在物质匮乏时期,狩猎动物较之农业种植、采集野果更能为人类补充蛋白质、提供能量,进而形成了一种集体潜意识。因而,即便在不存在饥饿威胁的当代,进食野味已经没有了生存适应意义,在科学上也已否定了野味的味觉体验和营养价值,但野味山珍还有饮食等级化的符号意义,唐朝诗人李白曾作“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①,珍奇野味代表了具有优于他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早年生存环境恶劣的个体在拥有足够的经济地位时,更表现出物质主义和炫耀性消费心理(Ahuvia,2002;孙时进,2020)。为了满足进补或虚荣的心理,人类不惜破坏生态,大规模猎杀、贩卖、进食稀有物种。人类对自然的不尊重、对其他生物的藐视致使人类必然接触到更多非人类社会的病毒,埃博拉、艾滋病、SARS 肺炎、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疾病的发生均与人类对其他生物栖息地和生命的不合理侵占、侵害有关。这警醒我们,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时,不能把自我凌驾于自然之上。如果人类不能意识到不但人与人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人与整个大自然也是命运共同体,那么,即便这次疫情被控制、新冠病毒被消灭,那一定还会有新的疫情、新的病毒或地震、洪水等其他自然灾害的再现。

2.2 疫情蔓延:人与人关系的失调

疫情防控过程中,暴露了人与自我关系失调的问题。在疫情初期,群众在接收信息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却表现出了两类不正常心态,一是回避,二是恐慌,这两类心态成为疫情蔓延的加速器。其实这两种心态是人与自我关系失调的表现。

人的自我认知发展滞后,缺乏省察能力,致使疫情中出现了回避、恐慌的情绪情感问题。研究表明童年期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在未知情境下更容易出现恐惧、紧张以及回避等内部化的心理问题(孙时进,2017)。回顾社会发展历程,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处于物质匮乏的生存环境里,生命史理论认为童年期处于不可预测的环境会让人产生“快”策略,这类个体更注重短期利益、更加冲动、及时行乐、罔顾社会规则(Bruce & Eills,2009;Aurelio José Figueredo,2005,2006)。由于快节奏的社会发展,让人们没有时间觉察自我出了问题,导致“快”策略的缺点在特

殊条件下被放大,因而,很大一部分群众出现了回避的心态,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期,仍然违反政令、不顾劝阻、聚会享乐,致使出现了很多聚集性传播的案例。另外,童年的不安全感在疫情期间再次浮现,致使部分群众表现出过度恐慌的心态,出现大量囤积物资,轻信谣言、传播谣言的行为。恐慌和回避的心态均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问题,人的自我认识、自我接纳、及自我控制都存在的问题。而心理健康发展的人则拥有理性平和的心态,表现出了积极自我管控、传播正确信息、并依托新媒体以幽默的方式缓解了恐慌氛围。可见,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发展能助益防控疫情。

另外,疫情防控过程中也暴露了人与他人关系失调的问题,人与他人关系失调主要体现在社会信任上,包括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不足、群众与传媒之间的信任不足,行政主体和群众之间的信任不足。传统的乡土社会从熟悉中得到信任,疫情中流行的“大喇叭”宣教似乎还有乡土社会的影子,而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容易,但是变得“熟悉”却越来越难,正如费孝通(2004)在《乡土中国》所说,“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因为陌生人社会的流动性、匿名性,使得疫情蔓延阶段人人自危,见到人就恐慌,甚至常因是否佩戴口罩等问题引发争吵、暴力事件。不仅对陌生人的信任缺失,群众对传媒的信任度缺失也是影响疫情防控的原因之一。部分公共媒体的报道失实、部分公众人物的诚信缺失造成了疫情防控的关键期信息传递的困难,使得居心不良的自媒体、个人有了可乘之机,造谣、传谣屡禁不止。另外,虽然政府在此次疫情中展现了强大的国家能力,但也暴露出公共决策主体与群众之间信任不足的问题。在疫情初期,武汉的行政系统反应较慢,医疗救济体系应对措施不足,生活物资保障不足等,其实背后反映了部分干部并没有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不相信别人、不相信组织、不相信群众。而由此带来了部分群众对行政主体的不信任,有问题不通过正规渠道反映,利用互联网制造不良舆论,这种互不信任的互害行为增添了社会治理负担,也带来了疫情防控上的一系列问题。

2.3 疫情的意义

在德特勒夫森所著的《疾病的希望》中提到“疾

^① 羞同馐,直同值。

病意味着离开一种和谐,或对一种一直是平衡的状态提出疑问……疾病能告诉我们通往完好的路上,我们还缺少什么……”(托·德特勒夫森,1999)审视疾病、灾难的视角不应仅仅固着在损失和哀痛上,从积极的角度审视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才能获得进一步强化发展的心理动力和社会动力。

疫情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灾难形式,如果应对不当它可以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历史上疫情甚至会造成种族的灭绝。但如果应对得当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小的损失。它对人类的危害不只是取决于这个病毒的性质和科技的水平同时更取决与人和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

这次疫情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尽管我们这次科技水平和公共卫生系统的硬件构建可以说已达国际一流水平,但疫情发展初期的一系列问题不是医学科技等“硬”的“物”的问题,而是出在了看起来是“软”的“人”的问题上。部分官员和部分专家缺乏实事求是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给早期的防疫抗疫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疫情的出现不只是考验了我们的科学技术的水平,同时也是对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考验,让我们在快速发展中各方面的问题都暴露和显现出来。疫情提醒我们看到自己的薄弱环节和今后需要改进的地方。人们常说“多难兴邦”,但灾难和疫情是否兴邦取决于我们能否学会反思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如果能充分利用好此次疫情带来的警示,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狠抓精神文明的建设。在个人心态的建设上、社会治理的方法上下功夫,促进人、我、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减少、甚至避免灾害的发生,真正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3 战疫:构建良好的社会心态

要促进人、我、自然的和谐发展,个人成长是关键。个人成长的核心在于构建良好社会心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着重强调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并提出“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亲善友爱的社会心态”的工作重点。拥有这样的社会心态,保存良好的自我认识水平、稳定的情绪情感、互信互助的社会关系,是我们预防和应对各种风险和灾难的重要保证。

3.1 自尊与自信

从认知层面看,良好的社会心态,需要有正确的自我认知作为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已从文

盲率80%发展到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4.2%,人民群众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对客观世界认知水平的提升促进了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这些成绩不容忽视,然而,扫盲不仅要扫文盲,更要扫心盲。为了更好的促进人与自我的关系,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把提高个人的知识水平和认识客观世界的水平,还要提高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觉察的能力和人与自己的内在和谐水平上。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心理学的研究证实了早年生活于物质贫乏和不稳定的家庭、社会环境中会给个体带来心理贫穷感以及和行为失灵等问题(徐斐,2019;Shah,2012;Mullainathan,2013)。即便成年后,物质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得到提升,童年逆境经历也无法不药而愈,自卑和低自尊的自我认知根深蒂固。改革开放前的经济的贫困和社会的不稳定给人留下的心理问题会持续影响人身心健康水平。所以在如今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尤其要注重个人自尊、自信的培养。自尊是一种正确的自我评价,是对自我的尊重,以及获得尊重的意愿,自尊心态能够抵制虚荣的作祟,具体到这次疫情产生的可能原因的滥食野生动物其背后的动机就和非理性炫耀行为及自卑有关。自信是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应对特定情境的信念,自信心态能够抵抗自卑和自大的心理,一方面不再妄自菲薄、惶惶恐恐,另一方面不会盲目自大、轻蔑傲慢。培养自尊自信心态有助于个人自我觉察能力的提高,为构建人与自己、人与他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打下良好基础。

3.2 理性与平和

从情绪情感层面看,良好的社会心态,需要保持理性平和的心境。理性不仅是一种按照事物发展规律应对问题的能力,更是一种难得的涵养性情,汉代徐干在《中论·治学》中提出“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平和更是中国古代便有的对危机事件中人的情绪情感状态的期待,苏洵曾在《权书·心术》指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重要性。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伴随着经济增长、利益分化,社会纠纷矛盾不断涌现,社会戾气有蔓延趋势,这就要求无论行政主体还是人民群众都要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中国政府呈现出了高质量的信息和数据公开,并根据病毒研究进展

在短时间内陆续更新了七版《新型冠状病毒诊疗方案》,理性心态有助于国民根据信息分析形势,进而做出有效决策,而部分非理性的民众则陷入互相怀疑、互相攻击,表现出不顾现有事实证据,轻信不实传言,陷入各种阴谋论的漩涡。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是降低疫情的破坏力和控制疫情发展的强大的精神武器。

3.3 亲善与友爱

从社会关系来看,良好的社会心态,需要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亲善友爱的联系。随着交通与通信产业的高度发达,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人与人联系空前紧密的社会。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与相隔千里之外的个体产生联系,不仅能够交换文本信息,甚至进行物质交换和人力资本交换;即使走出国门,认识地球另一端的朋友,同样朝夕可就。此后,世界再无远方,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人类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如此紧密的社会网络也为人类带来了极端风险,远处的困厄随时可能变成近处的哭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存在对社会关系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亲善和友爱将成为最具社会适应力的人际关系标准。亲善是要摒弃偏见、刻板印象,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友爱是要克服自私利己的取向,实现相互关怀、相互帮助等亲社会行为。此次疫情中告诉我们亲善友爱关系对在防疫抗疫中的重要性。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蔓延证明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不再是某个国家的内部问题,因此不仅仅要求人与人之间建立亲善友爱的社会关系,还要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种族之间形成亲善友爱的关系,因此也希望通过这次疫情能够催生这种新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

4 和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

促进人、我、自然和谐发展的另一个关键策略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从历史的经验看,人类不是只有把各种病菌、病毒斩尽杀绝一条路,而更理想的方式是找到一种与它们和谐共生的方式。每一次流行性病毒的爆发都是一场检验人类社会生存适应性的考试,此次疫情也是对社会治理水平的一次大考,考试的意义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找到解决人、我、自然关系的失调与社会发展的失衡的解决途径。此次疫情也为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以下三点启示。

4.1 物质和精神的平衡

要减少工具性倾向,加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的平衡发展。改革开放 40 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 40 年,但仍存在精神文明建设过度服务物质文明的工具性倾向。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基础教育更偏向于实现物质文明,教育的重心集中在能够提升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学科,民间更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虽然,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科学教育的偏重,但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教育由有所侧重转向平衡发展至关重要。正如前文所述,即便如流行性病毒这类社会外部风险,也由于人的决策和行为的不断渗透,变为具有人化特征的风险(范如国,2014)。事实上,从科学视角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已经较为完善,其中检测、预警与报告制度均有科学和技术的论证,而在新冠状肺炎爆发初期还是出现了公共决策失灵等现象,因此,着重强化与完善人化风险治理工作是疫情给我们提示。治理人化风险的重要手段就是加强人文教育,不仅要在九年义务教育体系增加人文教育的分量,还要结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人文再教育,要把心理成长、文化成长的能力传授给人民群众,并相信人民群众觉察觉醒的潜力,相信群众自身的力量,依靠群众心理能量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早日实现。

4.2 自由与规范的平衡

要营造共治环境,加强政府嵌入与个体自由的平衡发展。自由是人的意志、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是人类美好社会的向往。但是真正的自由是有条件的,马克思认为真正自由的人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而当前世界还没有条件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自由个性只能得到片面的发展。但是,显然一些国家人民没有意识到现有自由个性的片面性。自由的前提是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有独立思考 and 理性判断的能力。显然,“要使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程度的全面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若非如此,政府秩序维护必须优先于自由,这就意味着国家在教育、司法、管理等方面对人民社会生活的适当介入,国家有义务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公开透明的传递信息,建立保障人民群众权益的法律法规,并有紧急情况下限制个体行动自由的权力,避免过度自由主义导致自我对他人、社会、自然的恶劣影响。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良好的规范的基础上的。在这次疫情中

凡是这对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疫情的防控也就比较好。这里有很多可供研究和总结的东西。

4.3 统筹与协作的平衡

释放多元共治活力,加强政府统筹与多元主体协作的平衡发展。目前,中国正处于由政府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加速期。长时间的政府垄断社会管理职能的历史,形成了政府本位的文化,政府本位势必会产生行政傲慢。而且,在存在着政府本位的时代,社会中的组织也会感染上组织本位的问题,及其带来的组织傲慢(张康之,2014)。现阶段,不得不承认国家还保留着大部分职能由政府或官方社团组织承担的习惯,使部分社会职能作用无法有效的发挥。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系统,兼具稳定性(Robust Property)和脆弱性(Brittleness Property)的特点,这就要求把社会职能更多的释放给多元主体,增加丰富社会关系的“节点”,使得一般性社会节点的数量远远多于中心节点,这些一般性节点中的某个或某些节点随机消失,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结构和秩序,进而表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范如国,2014)。为了增加“节点”的丰富性,要把部分主体从“社会治理对象”的身份转化为“社会建设的参与者”,给予除行政主体以外的民间组织、个人以信任,增加多元主体的熟悉、信任、协调程度。另外,要强化、优化政府统筹能力,要以人民为中心,避免行政傲慢、组织傲慢对人际和谐的破坏,造成行政体系这一中心节点丧失支撑作用。就此次中国对抗疫情的经验来看,党中央统筹作战,全国一盘棋,过程中体现了个人、企业、民间组织等主体应对社会问题的优越性,甚至弥补了官方组织的过失和盲点,如果能够释放更多社会职能给多元主体,相信可以有效解决陌生人之间、群众与传媒之间,行政主体和群众之间的信任不足问题。

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中处理好统筹与协作、政府与民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家能力的增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个体自由和民间组织活力的降低,好的社会治理恰恰是形成两者同时增强的良性互动。这次疫情中,尤其是武汉封城的早期阶段活跃志愿者和民间公益组织很好的弥补了政府力量的不足,在抗疫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是保证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健康

发展的重要法宝。

5 总结

疫情作为全球大流行性疾病,不再是某个人、某个行业、某个政府的问题,而是人类之间、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困境的体现。如果人类依旧保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不能正确自我觉察、不相信他人、傲慢自大的对待自然,那么人类所有为了物质文明的努力可能会变成时代之殇。通过这次疫情我们需要一次全面深刻的反思,更好地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平衡、自由与规范的平衡、统筹与协作的平衡。把物质和财富的增长、精神和心灵的成长以及社会和谐发展同步推进,达到人与自己、与他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那么疫情这场灾难就会成为“兴邦”的推动力,开启人类的一个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 范如国. (2004). 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 4, 98 - 120.
- 费孝通. (2004). *乡土中国* (pp. 7 - 8). 北京: 北京出版社.
- 韩鹏宇, 郑慧芳, 毕秀欣, 等. (2020). 从 SARS 到 COVID - 19: 进化与启示.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5.1284.R.20200306.1740.012.html>.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 截至3月25日24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EB/OL]. <http://www.nhc.gov.cn/xcs/yqfkdt/202003/f01fc26a8a7b48debe194bd1277fdb3.shtml>.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 (1979).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孙时进, 孔云中, 周洁. (2020). 童年环境、物质主义与炫耀性消费的关系研究——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调节效应.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 215 - 223.
- 孙时进, 齐巍. (2017). 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对成年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 *中国特殊教育*, 209(11), 81 - 85.
- 世界卫生组织. (2020). 世卫组织总干事2020年3月16日在2019冠状病毒(COVID - 19)疫情媒体通报会上的讲话 [EB/OL]. <https://www.who.int/zh/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16-march-2020>.
- 托·德特勒夫森, 吕·达尔克. (1999). *疾病的希望* (pp. 8 - 12).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徐斐, 孙时进. (2019). 心理贫穷感对决策的影响. *心理学探索*, 39(6), 540 - 548.
- 张康之. (2014). 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 2 - 13.
- Ahuvia, A. C., & Wong, N. Y. (2002). Personality and values based materialism: Their relationship and origins.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12(4), 389 - 402.
- Aurelio José Figueredo, G. V., Barbara H. B., et al. (2005).

- The K – Fact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life history strateg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9, 1349 – 1360.
- Aurelio José Figueredo, G. V. , Barbara H. B. , et al. (2006). Consilience and life history theory; From genes to brain to reproductive strategy. *Developmental Review*, 26, 243 – 275.
- Bruce, J. , Ellis, A. J. F. , Barbara H. B. , et al. (2009).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risk. *Human Nature*, 20 (2), 204 – 268.
- Chinese SARS Molecular Epidemiology Consortium. (2004). Molecular evolution of the SARS coronaviru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SARS epidemic in China. *Science*, 303 (5664), 1666 – 1675.
- Mullainathan, S. , & Shafir, E. (2013).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New York: Macmillan.
- Shah, A. K. , Mullainathan, S. , & Shafir, E. (2012). Som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too little. *Science*, 338 (6107), 682 – 685.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elf, Others and Nature : A Social Psychological Reflection of COVID – 19

Sun Shijin Qi Wei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 – 19 epidemic is not only a ques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an issu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 occurrence and spread of the new coronavirus epidemic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imbala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n and others, and man and himself. The harmony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self and others, as well as the nature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guarantee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ultivating a good social mentality of self – esteem and self – confidence, rationality and peace, goodwill and friendship, grasping the social governance methods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freedom and regulation, overall planning and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Key words: COVID – 19; social psychology; harmonious development; social mentality; social governance